

安德烈·高兹对资本的准生态批判

温晓春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高兹从生态理性出发,认为以促进资本积聚为目的的生产必定要将人的需要和自然纳入其麾下。于是,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也无法真正地满足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使满足也是通过社会生产出类型各异的“需要的历史形式”间接地实现。实际上,这是历史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象”。恰恰在人享受这种“假象”的同时产生了需要“真相”的强烈之需求,即质的需要、真正的自由的需要、创造性的需要。高兹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揭示人的需要、自然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关系,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安德烈·高兹;资本主义需要;生态理性;准生态批判

中图分类号:F032.1;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5-0060-05

A Critique Theory of Capitalist Need Based on Ecological Reason: The Quasi - Ecolog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of Andre Gorz

WEN Xiaoch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Gorz argues that the production which aims at promot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happens to incorporate human needs and nature into its content. Thus it leads to extremely short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can not satisfy the basic of human living. Even if it would be satisfied, it must be accomplished indirectly by producing kinds of “Historical forms of needs”. Actually this is an illusion of satisfaction needs. Therefore, the qualitative needs real needs for freedom and creative needs would be a socialist satisfaction needs. Gorz unfolds what really 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needs, nature and capital, so he provides us with a practical theory.

Key words: Andre Gorz; needs of capitalism; ecological reason; quasi - ecological critique

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烈·高兹以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批判而闻名,不过在其政治生态学范式之前,存在着一个资本逻辑的准生态批判阶段,其标志性文本事件是高兹的《劳工战略》(Strategy for Labor, 1964)。20世纪60年代,高兹发觉“工业增长在人类环境中驱使大规模移民和深层剧变正在耗尽或破坏自然资源(如空气、空间、光、寂静),同时暴露或增强了先前没有被感觉到的某

些需要”,^{[1]77}即一种根本上的人之存在意义的、质的需要。在《劳工战略》中,“高兹将哲学的雄辩与尖锐的政治评论结合,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的浪费和非理性的本质。”^[2]它愈加吞噬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剥夺人的基本需要,局限人的劳动能力,遮蔽人的存在意义。此时,已显露出他对工业社会的资本之逻辑展开准生态批判的端倪。

收稿日期: 2011-06-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 2007 年资助项目(07JJD71002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基金资助项目(2010EKS002)

作者简介: 温晓春(1978-),女,辽宁鞍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 新的需要与基本需要

高兹指出,基本需要不是预先设定的,是历史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生长的,同时又受满足它们的手段的发展制约,受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的发展限制。“最终,它们是受在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生产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变革的制约。”^{[1]77}需要的满足程度与财富的多少不能直接勾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财富增加不必然地能够满足基本需要。他强调,人本应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这一思想明显受到萨特的“人是自由的”,懦夫与英雄并非天生,而在于自我选择的思想影响。但高兹也指出,人所安身立命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着、束缚着人。他认为,在特定的社会中,人的唯一的生活方式是由生产结构及其技术所决定。同样,技术决定着需要的环境,决定着需要能够得以满足的对象,决定着消费的对象及其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

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地。所以,生产创造着消费者。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3]

高兹指出,既然生产决定着需要的对象,决定着需要的方式,那么又是用什么来保证生产对于需要的决定作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期坚持认为是市场,但高兹指出,这一观点在今天已很少有支持者了。在当今社会,一切都由资本的生产逻辑驱动,市场也听命于它。也就是说,资本决定着社会生产,生产又决定着需要的对象和方式。实际上,资本决定掌控着人的需要。追求最大利润是资本首要的迫切需要,人的基本需要必须服从资本的这一迫切需要,资本需要具有优先权。在此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次要的,商品的包装和品

牌名称被设计用于在产品的量、质和特性等方面欺骗消费者,刺激消费者购买,满足资本利润的需要。这种注重形式(accessory)而非实质(essential)地追求利润率的提高,而非使用价值的改善的倾向已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绝对浪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最适应人类和经济的目标与追求从投资资本中获得最大利润只是偶然的一致。”^{[1]78}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决不会自动地为更好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进行生产;即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增长,也不过是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副产品。

尽管人的基本需要在很大范围内没有被满足,垄断资本仍不顾自然资源的耗竭,人的劳动力的浪费,造成匮乏的加剧。此处的匮乏,一方面指自然资源的不足(如空气);另一方面是时间的缺少、集体服务和文化可能性的缺乏。“浪费与匮乏共存是资本主义制度主要的谬论”。^{[1]82}

高兹指出,在资本逻辑不断扩张下,它不仅使消费品象征性地穿上了所谓需要容易得到满足的外衣,同时也催生一些新的需要。这些需要不再是“人-动物”(human animal)的需要,而是潜在的创造性的“人-人”(human man)的需要。具体而言,这些需要就是对自决权力、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信息(information)、交流(communication)、情谊(fellowship)的需要;是在工作与休闲中,不仅从剥削而且从压抑和异化中获得自由的需要。因此,这些需要是无法由提高工资额度来得到满足的。它们是人在工作中寻求满足和意义,即在工作与休闲中自我实现和自决,协调社会与个人存在的、自由的需要。“这些需要可导致一种社会必须被根本变革的意识”,^{[1]4}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根植于这些需要之中。它们的存在依赖于社会个人赢得其潜在的自由意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已被丰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所削弱和压制。

于是,一个深刻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即本质上是量的标准无法评价越来越以质的形态和目的展示出来的人的需要和发展。简言之,经济价值与人的真实目的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原本,人的真实目的是经济价值的基础,如今,本末倒置。

可见,高兹所说的基本需要是人的吃、穿、住等最低生存需要,是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的生活必需

品的需要;而新的需要则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拥有自决权的、自由的、创造性的需要,即人之为人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品质的需要。无论是人的基本需要,还是人的新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受着资本逻辑的操控,为谋求资本利润服务。但也正是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生发出要求自决、自由的呼声。

二 历史需要和需要的历史形式

高兹强调,事实上,千疮百孔的物质环境中的增长、恶劣的生活条件、满足基本需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较为复杂和成本更高的必需品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比在一个物质财富丰厚和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更容易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发展。也就是说,需要在恶劣的环境中更容易生发。当然,这种需要既有资本主义故意刺激制造的虚假需要,也有人的真实的基本需要和新的需要。虚假的需要通常以“历史需要”的状态存在,事实上,它只不过是“需要的历史形式”而已。他举例说明:

例如,空气的需要立即被理解为度假、公园、城市规划、逃避城市的需要;适当的睡眠的需要被直接的理解为体力和脑力放松的需要,这种需要已成为品味、防止噪音的舒适的寓所的需要;吃的需要,在大的工业城市已成为在工作之后能够立即消费食物的需要——即,自助餐厅、饭店、罐装食物和需最少准备时间的食物的需要;清洁的需要,在缺少阳光和自然海滩或河流的地方已成为卫生设施、洗衣店或洗衣机等需要,这些都是事实。^{[1]89}

这些例子中的“空气”、“睡眠”、“吃”等都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不是相应于人的物质财富丰盈及其能力发展全面的新的和“丰富的”需要;它只是永恒的生物需要,但在当下社会却直接地被表达为“度假”、“逃避城市”、“体力和脑力放松”、“快餐”等高于基本需要的,以“非动物的人”的需要的历史形式。实际上,人们并没有脱离基本需要的状态,即基本需要没有被真正地、完全地满足,没有提升到人作为人的较高层次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需要。所以,高兹强调“这些基本需要呈现的历史形式同样不能与历史需要混淆。”^{[1]89}

此处的“历史需要”是指需要在质上的不同,因

社会历史变迁产生的人的真实需要,而非需要呈现的形式多样,即量上的丰富。所以,“历史需要”与“需要的历史形式”截然不同,前者是质的,后者是量的、形式上的。“需要的历史形式”是怎样以“历史需要”的形式出现的呢?高兹进一步指出:

因为在人的本性被破坏和歪曲的情况下,基本需要不再被满足,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基本的和历史的需要之间的区别就成了问题和造成混乱的危险——或甚至被理解——除了以间接的方式。在需要的自然起源及其自然对象之间,我们注意到不仅是人的生产,而且也是根本的社会生产的工具这个插入物(the interposition of instruments)。在自然环境及其由社会环境替代的破坏,基本需要只能以社会方式来满足:它们成为间接的社会需要,或甚至更准确地说,基本需要被社会中介。^{[1]89}

自然环境的贫瘠,生态关系的紧张,资源(空气、水、光、寂静、空间)的耗竭或破坏直至今日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的。今天,这些被社会生产的“丰富的”方式遮蔽,麻痹人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生存意义的意识。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也必须通过社会生产、服务和交换的中介来实现,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动地为了防止破坏,而预先采取以替代的形式来补偿所遭受破坏的需要,弥补个人所遭受的痛苦掠夺。

综上所述,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需要理论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较之马克思的时代已有显著的变化。在他看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已失去了自然基础——缺少基本的必需品,即大多数人处于基本生存无法保障的悲惨状态。如今,大多数人不再缺少基本生活的必需品。那么,人的基本需要得到真正满足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高兹为了唤醒人们早已被麻痹的意识,具体地指出基本需要和新的需要之间的差异问题。这是高兹的需要理论与马克思需求理论的提出在时代背景、现实的实践生活和存在体会上的不同。高兹的需要理论虽然着墨不多,但已将迷雾稍稍拨开,使我们能够窥见迷雾后面美杜莎的头:一方面,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的结果必然造成匮乏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的满足又受制于社

会生产,它的对象、方式等都由生产所决定。以促进资本积聚为目的的生产必定要将人的需要和自然纳入其麾下,听其指挥,受其控制。于是,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也无法真正地满足人的生存基本需要,即使满足也是通过社会生产出类型各异的“需要的历史形式”间接地实现。实际上,这是历史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象”。恰恰在人享受于这种“假象”的同时产生了需要“真相”的强烈之需求,即质的需要、真正的自由的需要、创造性需要。高兹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揭示人的需要、自然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关系,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 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生态改革及其限度

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保持着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在联系,即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与此相反,生态主义的政治学关注的是在主导的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寻求环境污染的最小化,而不是改革造成生态问题的工业实践本身。这种实践造成的只能是一种无边界的帝国主义,即环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

在高兹看来,生态运动的支持者过于自信与乐观,他们把生态运动视为与普选一样具有颠覆性。生态学自身有能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障碍,并促使其发生改变。高兹指认这都是伪装,并认为是时候该结束此种伪装了。“生态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更大斗争的一个阶段”。^[4]因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运动及生态学自身不具有内在解放性。为有力论证他的观点,他从生态约束的角度深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生产动机。同时,他揭示出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可能地被生态约束影响和改变的,而不是相信这些约束会在它们自身内或由它们自身导致资本主义的彻底消亡。

生态是资本积累的物质先决条件。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此生态问题密切相关的全面的社会危机。

所有生产都是破坏性的。如果生产没有导致不可逆的自然资源的耗尽,即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

能够担起生产的重负,再生产自身,那么“这种破坏恰恰是生产的条件”。^{[1]20}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逻辑的驱动必然破坏生态环境,任何生产都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联系在一起。它生产着、贩卖着破坏,并且不断破坏性地进行生产。只要存在利润动机,自然要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与利润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故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克服。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一切“非人为再生产”的资源都被视为免费的、可随意获取的,而这种“自然免费论”就是资本主义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诱因;利润动机与掠夺诱因的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它是一种在增长、积累、消费不断加深和恶性的循环消耗,正是它导致各种危机的产生。生态因素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均被生态危机所激化”,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1]21}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按照这一逻辑,“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确保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自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而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1]5}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使劳动变得轻松愉快和幸福美满,不是为了使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社会生产与自然资源之间实现协调与平衡,而是以最大的社会成本来换取极少数人的垄断利益和垄断地位。资本主义愿意投入大量资金以维护机器、厂房、营销的‘最佳化’,也不愿付出只需很少成本就可以使劳动者改善健康和精神状态的‘人道投资’,降低成本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

但当人类的拥挤现象与环境的污染程度造成增长和生产衰退,甚至停滞,西方国家造就的文明正在遭受无法挽回的急剧衰败的阵痛的时候,资本主义为了增长和继续使自身运转,谋取利润,不得不投入一定资金再生产环境和资源。因此,高兹指出,“再生产环境的需要已成为经济因果关系上的一个链条。”^{[1]5}在污染控制设备方面的投入必然增加资本有机构成,净化设备的资产回收也定会增加再生产的成本,但是这些设备不能出售以获取利

润。为了避免利润率的缩减,保证增长和生产的顺利进行,提高商品价格是资本主义唯一的选择。可见,即使被迫从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资本主义也会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生产成本,资本利润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一种为了弥补资源掠夺而投入的成本,最后依然以“回收”的方式回到拥有价格优势的资本家手中。

诚然,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发起的生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促使其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但资本主义的环境和资源再生产不但没有切实地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相反,它却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恶化,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的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人自身基本生存能力的退化和丧失。

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某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范式^[5]及大多数生态理论家的范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高兹从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他的生态批判不仅是全面的,而且还有一个尤为显著的特点:他从生态学内部挖掘出人文的、政治的意蕴,即政治的生态学方法,这种方法展现了一种生态和谐的生存方式。因此,在当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后”学泛滥的局面之下,我们回到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目的主要有二:第

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后”化才能走向新生?高兹对资本主义需要的生态批判显示出,他并没有像某些后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放弃马克思的经典范式和经典范畴,而是更新了它们,以便对资本逻辑进行更加准确的批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在更新核心范畴和基础概念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和活力,而不是抛弃他们。第二,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与新社会运动相结合才能确立起真正的历史主体和客体的辩证运动。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运动的结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给予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激进化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生态政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实践活力。

参考文献:

- [1] André Gorz. Strategy for Labor: A Radical Proposal [M]. Boston : Beacon Press, 1967.
- [2] Finn Bowring. André Gorz and the Sartrean legacy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2000:5.
- [3]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 [4]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3.
- [5]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骆晓会